

哀悼与忧郁症^{*}

——论《理智与情感》中的心理与权力

武静 范一亭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 100083)

摘要:《理智与情感》是简·奥斯丁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小说中性格迥异的姐妹俩在“失去所爱”时,理性的姐姐埃莉诺表现出一种“哀悼”,而善感的妹妹玛丽安则进入一种“忧郁症”状态。弗洛伊德的《哀悼与忧郁症》区分正常的“哀悼”和病理性“忧郁症”,而实质上无论是“哀悼”还是“忧郁症”,其背后隐含的是个体与权力在心理层面的博弈。本文梳理“忧郁症”这一心理名词在文化理论史上从弗洛伊德到巴特勒的衍变,强调精神层面主体的分裂是主体服从的基础,而“忧郁症”造成主体反对自身的转向,是权力迫使主体“服从”的必经之路。研究表明,埃莉诺的“哀悼”事实上是其在权力与个体之间成功斡旋的结果,屈从中不乏女性主义的能动性;而玛丽安的“忧郁症”则展现权力在心理层面的管制和外部规训的共同作用下迫使女性个体走向服从,而姐妹二人不同的心理症状无疑揭示奥斯丁小说的心理、性别与权力结构的关联。

关键词:《理智与情感》; 哀悼; 忧郁症; 权力; 心理; 性别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6)03-0152-06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3.031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On Psychology and Power in *Sense and Sensibility*

Wu Jing Fan Yi-t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Elinor and Marianne, the two sisters in Jane Austen's first novel *Sense and Sensibility*, when facing "the loss of a beloved person", respond quite differently. Elinor exhibits a process of Freudian mourning whereas Marianne enters into a state of melancholi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rgue that the psychic process of mourning or melancholia demonstrates the conflicts between individual subject and the Foucauldian disciplinary power at the psychic level. By drawing upon the cultural theoretical history of melancholia from Freud to Judith Butler, the paper analyzes how melancholia leads to the subject's turning back upon itself as the indispensable stage of subjection. While Elinor's mourning is the result of her mediating with the disciplinary patriarchal power, thus manifesting both the subordination of the subject and her feminist agency. Marianne's story of melancholia as the outcome of the substitution of the subject by the psychic form of patriarchal power results from her fierce rebellion against it. Eventually, Marianne yields to the double discipline of power at the physical and psychic level by symbolically falling into great sickness, hence gets into the state of subjection. By so doing, Austen presents an interfacing of power, gender and psychology.

Key words: *Sense and Sensibility*; Mourning; Melancholia; power; psychology; gender

1 引言

简·奥斯丁(Jane Austen 1775-1816)作为经典作家的地位毋庸置疑。19世纪著名的莎士比亚批评家辛普森(Richard Simpson)将奥斯丁与莎士比亚相比肩(Wiltshire 2003: 59)。到了20世纪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将奥斯丁视为欧美文学史上的心理大师亨利·詹姆斯和普鲁斯特的先驱(Southam 1987: 281)。本文借助弗洛伊德《哀悼与忧郁症》(1917)一文以及当代文化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带有福柯色彩的“忧郁症”概念,来考察奥斯丁的这部代表作。研究表明,小说中性格迥异的姐妹俩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19世纪英国文学文化思想史研究”(12YJCZH041)的阶段性成果。

在爱情中虽然都有过“失去所爱”的经历,但姐姐埃莉诺“思想敏锐,头脑冷静”,妹妹玛丽安则“没有节制,过于感情用事”,因此理智的埃莉诺在失去所爱时表现出克制的“哀悼”(mourning),而玛丽安则一病不起,进入一种“忧郁症”(melancholia)状态,最终埃莉诺得偿所爱,而玛丽安则退而求其次,“怀着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友情”嫁给了本不喜欢的布兰登上校(奥斯丁 2013: 9 276)。此等过程迥异却结局类似的心理衍变能更好地帮助我们深层次认识奥斯丁小说中的权力与性别的关系。

2 从心理到权力: 弗洛伊德、福柯与巴特勒

在早期对奥斯丁的评论中,学者通常二元对立地看待作家对“理智”与“情感”关系的处理: 认为埃莉诺代表理性,而玛丽安则代表感性或者非理性,整部作品是对理性的褒奖和对感性以及非理性的批评,是现实主义对当时“淹没在一派伪浪漫主义的感伤泪水之中”的英国小说的有力回应。奥斯丁研究专家巴特勒(Marilyn Butler)认为: 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奥斯丁的作品表现张扬情感的激进派(雅各宾派)和重视理性、责任以及自我克制的保守派(反雅各宾派)之间的思想论战,《理智与情感》便是这一论战的鲜明代表,反映奥斯丁的保守倾向(黄梅 2012: 235 - 236)。表面上看,这是奥斯丁支持理性的保守派的表现,然而,探寻理性和非理性背后深层次的权力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这其中蕴含着权力与个体之间的博弈。正如福柯所说,“权力的效果能深入每个人最精微和潜藏的部分”(Foucault 2007: 216),只是由于“社会规范在心理层面的作用为规训权力提供更为隐秘的作用方式”,于是“这种规范在精神心理上的运作为管制的权力提供一种比外在的强力更阴险的路线,它的成功使它在社会范围内心照不宣的实施成为可能”(Butler 1997: 21)。所以“感情强烈,然而会克制自己”的埃莉诺通过斡旋个体意愿与外部权力,使权力规训在心理层面以无害的“哀悼”形式出现;而“感情用事”、“没有节制”和“不谨慎”的玛丽安则患上“忧郁症”,使权力规训以一种新的心理形式出现,使她“天生注定要发现她的看法是错误的”(奥斯丁 2013: 9 276)。与其说是“天生注定”,不如说是权力博弈、协商与规训的必然结果。所以埃莉诺的理性只不过是主体与外部权力斡旋的结果,而玛丽安的非理性则是对规范的反叛,但反叛必将受到权力的惩罚和规训,表现为主体在权力心理层面的管制和权力外部规训的共同作用下走向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服从(subjection),整个小说着重表现的正是这种权力与个体在心理层面的博弈。

美国文化理论家巴特勒(Judith Butler)将福柯的权力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做了完美的嫁接,她指出: 人们“习惯于把权力想象为一种来自外部的压迫主体的东

西”,但是根据福柯的观点,服从意味着被权力屈从(subordinated)的过程,同时也是主体形成的过程,即在屈服(submission)中,权力同时形成主体(Butler 1997: 2)。然而,无论是阿尔都塞的“询唤”(interpellation)还是福柯的“话语生产”(discursive productivity)都没有解释主体是如何形成的,那么这就形成一个悖论——“一种关于主体指称的矛盾性”,福柯对这一表述的矛盾之处并没有作详细的阐述。而关于主体如何在屈从中形成的问题,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尼采的《论道德谱系》中早有涉及,二者都将主体在屈从中的形成描述为外部权力以一种“转向”(turning)的姿态进入精神层面,并“构成主体自我认同的精神形式”(psychic form),这是权力进入精神领域的开端(同上: 2 - 4)。对此,巴特勒从后现代主义诗学立场对权力与心理之间的紧密关联进行细致的梳理。

根据巴特勒的分析,当权力不再被简单地看成一种“外力”而起作用时,权力在精神心理层面的运行便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德里达认为,福柯关于权力的理论实际上早已存在于弗洛伊德的理论中(Derrida 1998: 93)。格里斯(Wendy Grace)则认为,福柯从1970年开始将心理分析看成“权力在全景式监狱社会运行的又一种工具”(Grace 2013: 228),而心理学实质上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机器(ideological apparatus)来运行和起作用的”(Sloan 2007: viii)。弗洛伊德的理论于是就和边沁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理论有诸多相似之处(Tonner 2007: 1),也进一步印证“心理学本身是现代权力运行不可或缺的媒介”(Hook 2007: 2)。巴特勒由此指出,要厘清权力在心理层面的运行所采取的形式,首先必须“把权力理论和精神分析理论结合在一起进行思考”(Butler 1997: 2 - 3)。尽管福柯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很少提及,但对“服从”的解释又必须在心理层面进行探索,因为“主体(subject)的分裂……是处于服从(subjection)状态的主体基础”(同上: 1)。那么“服从”便意味着分裂的主体相对于自身的“转向”,在被权力屈从(subordination)的过程中,使权力成为“主体的自我认同的精神形式”,进而替代主体成为新的服从的精神主体(同上: 4)。如果说弗洛伊德对《哀悼与忧郁症》中主体的“分裂”和“转向”的论述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揭示这一新主体的产生,那么福柯化的巴特勒的权力理论无疑结合了二者的精华。

3 哀悼与忧郁症: 权力作用下主体的产生

福柯认为,“应该在其物质层面设法把握作为一种主体构成的服从(subjection)”(Foucault 1980: 78),然而无论是在福柯还是阿尔都塞的学说中,“主体都是以对权力的屈服为开端”,都没有解释主体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但是,“服从”不仅包含主体被权力屈从的过程,还包含主体形成(forming)的过程,所以要探寻“权力在主体屈从和产

生的双重作用(valence) ” 必须要厘清权力在心理层面运行所采取的形式(psychic form) (Butler 1997: 2) 。而弗洛伊德关于《哀悼和忧郁症》的理论恰好为权力在心理层面所采取的形式和运行方式提供理论基础: 即在忧郁症中“主体的分裂和其反对自身的转向” 构成“服从”的必要条件(同上: 168) 。通过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我们发现, 姐妹俩在面对“失去所爱”时, 埃莉诺呈现出一种哀悼的状态, 而玛丽安则进入“忧郁症”的状态。不同的是, 埃莉诺在哀悼之后恢复了自由的“自我”(ego) , 而玛丽安则在忧郁症中使“自我的一部分让它自己反对其他部分” , 造成主体的“分裂”和“转向” , 自我自身成为一个心理对象(psychic object) 被生产出来, 而这一过程预示一个新的主体的形成(同上: 168) 。

弗洛伊德指出, 哀悼和忧郁症有共同的诱因, 即“因为失去所爱之人而产生的一种反应, 或者是对失去某种抽象物所产生的一种反应, 这种抽象物所占据的位置可以是一个人的国家、自由或者理想等等”(Freud 1986: 203) 。但哀悼和忧郁症最重要的区别却在于, 哀悼是一种“痛苦的情绪”, “当哀悼工作完成之后, 自我再次变得自由无拘”(同上: 209) ; 而忧郁症则造成自我的分裂, “自我的一部分让它自己反对其他部分, 批判性地评判其他部分, 把其他部分当作它自己的对象”(同上: 207) 。在这种“自我反对自身的转向中, 自我自身成为一个心理对象(psychic object) 被生产出来”, 成为权力进入心理层面的开端(psychic inception) (Butler 1997: 168) 。

在小说中, 被玛丽安认为是缺乏感情的埃莉诺在失去爱人时经受巨大的痛苦, “转瞬间, 她几乎为感情所压倒——情绪一落千丈, 两条腿几乎站都站不住了……她竭力克制住自己的抑郁之感”, 在她平静的语气后面“隐藏着她从未感到过的激动和忧伤”以及“屈辱、震惊和惶恐”, “为即将把她和她心爱的人永远隔离开来的种种障碍而暗自悲伤”(奥斯丁 2013: 103, 104, 106) , 弗洛伊德将这种哀悼的情绪称为“痛苦的”情绪, 它表达的是“对哀悼排他性的虔诚”; 他进一步指出 “虽然哀悼涉及到主体与正常的生活态度严重分离, 但它绝不会让我们将其当作一种病态的情况, 并且认为它需要求助于医学治疗。克服哀悼只需一段时间的缓解即可”(Freud 1986: 204) 。所以埃莉诺并没有一蹶不振, 在分析个中缘由后, 她认为“爱德华的鲁莽行动给她带来了一时的痛苦……她迟早是会恢复平静的”(奥斯丁 2013: 193) 。对于埃莉诺来说, “现实已经表明所爱对象已经不存在了, 这进而要求所有的力比多(libido) 都应该从对这个对象的依恋中回撤, 这一要求遭到了可以理解的反对”(Freud 1986: 204) , 因为埃莉诺仍然“希望从露西的神色里发现点破绽”来证实“露西所说的绝大部分都是假话”, 从而逃避现实; 而当真相被证实, “除了她自己的主观愿望外, 无论如何也得

不出相反的结论”时(奥斯丁 2013: 102, 105) , 她便进入“哀悼的状态”, 即沉浸在一种“痛苦的情绪”中, 但是自我终究会接受这样的现实, “当哀悼工作完成之后, 自我再次变得自由无拘”。所以埃莉诺表现出的是一种理性的克制, 并告诉自己“他爱德华就是露西的丈夫了”(同上: 213) 。接受这一现实, 在哀悼过后, 力比多从这个依恋的对象撤回, 她认为“尽管人们可以说一个人的幸福安全依赖某一个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应该如此——那是不恰当, 不可能的”(同上: 193) 。于是, 她便积极地投入生活, 甚至当爱德华由于和露西私定终身而被剥夺了继承权后, 她还积极努力地为爱德华谋了个牧师的生计。

而玛丽安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面对同样的遭遇, 她进入了一种“忧郁症”的状态。弗洛伊德提出, 尽管哀悼和忧郁症有相同的表象, 如“非常痛苦的沮丧, 对外在世界不感兴趣, 丧失爱的能力, 抑制一切活动”等, 但“自我评价方面的失调”却是忧郁症独有的特征(Freud 1986: 211) 。这种“自我评价方面的失调”把正常的哀悼和病理性忧郁症区分开来, 使自我分裂, 造成“主体反对自我的转向”, 通过将对象回撤进自我, 并建构出与丧失对象本身的认同(identification) , 从而通过一种“自我折磨”的方式“表示了与一个对象相联系的虐待狂倾向和愤恨倾向的满足……通过自我惩罚这条迂回路径, 来向最初的对象复仇”(同上: 211) 。但是, 由于自我已经与这个丧失的对象相认同, 忧郁症便呈现出分裂出来的自我对其他部分自我的一种谴责和惩罚。所以, 在忧郁症中“自我评价降低, 以至于通过自我批评、自我谴责来加以表达, 这种情况发展到极致时甚至会虚妄地期待受到惩罚”(同上: 212) 。玛丽安在遭到威洛比的抛弃后, 经历了巨大的痛苦, “她完全变了样——变得病弱不堪——被折磨垮了”, “意志变得如此脆弱, 仍然认为现在克制自己是不可能的, 因此落得越发沮丧”, 人们认为她不可能再有“第二次恋爱”, 并且在一场风寒后一病不起, “差一点送了命”(奥斯丁 2013: 154, 198, 253) 。玛丽安自己却认为, 她的不幸遭遇“完全是自己造成的”, 并“一直设法为威洛比开脱罪责”, 把本应该对威洛比的谴责转化为一种“滔滔不绝的自我责备”, 认为自己“残忍自私”, “要痛恨自己一辈子”(同上: 156, 194, 253) 。即使在重病中, 她也渴望“有机会向上帝、向大家赎罪”, 而到头来“居然没有一命呜呼”, 于是“滔滔不绝地自我责备”(同上: 253) 。在忧郁症中, 面对一个失去的外在客体或理想时, 拒绝“从对这个对象的依恋中回撤”, 而使这个客体或理想回撤进自我, 进而取代自我, “以那个被放弃的对象来建构自我的认同”, “以这种方式, 对象丧失(object-loss) 变成了自我丧失(ego-loss) , 而自我与所爱之人的冲突变成了横亘在自我的批判性活动和由于认同作用而改变的自我之间的裂缝”, 这造成主体的分裂, 为主体的产生创造条件(Freud 1986: 206) 。

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姐妹俩有相同的经历,但其结果却不一样。对于埃莉诺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我会“尊重(失去所爱之人的)现实”,力比多会“从对这个对象的依恋中回撤”,从而在哀悼之后使“自我再次变得自由无拘”(同上:209)。而玛丽安则在忧郁症中“力比多并未流向另一个对象,它回撤进了自我”,进而取代自我(同上:209)。于是如巴特勒所说,在“自我反对自身的转向中,自我自身成为一个心理对象(psychic object)被生产出来,而这正是权力进入精神心理层面的开端(psychic inception)”(Butler 1997: 168)。

4 屈从与服从:个体与父权制权力的博弈与斡旋

福柯曾指出,“古典时代的人发现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这种人体是被操纵、被塑造、被规训的。它服从、配合,变得灵巧、强壮”(Foucault 2007: 154)。在任何社会中“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控制”,但是在古典时代末期,这种权力的运行更加精确有效(Foucault 2007: 154)。这种精确的“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杨卫东 2002: 54),因为在奥斯丁生活和写作的时代,整个社会正经历现代化进程,资本主义发展进入第一个辉煌阶段,农业慢慢发展成为一种资本主义产业(Irvine 2005: 7)。在这个正在生成的敛财逐利的社会中,个人角色和人际关系被资本主义利益关系所左右,形成一整套为资本主义发展所服务的婚姻、法律和社会规范,为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障。福柯指出,“规范(norm)的力量似乎贯穿在纪律(disciplines)之中,自18世纪以来,它与其他力量——法律、圣经、传统结合起来……成为古典时代末期重要的权力手段之一”(Foucault 2007: 207)。在这个过程中,女性渐渐被隔离开来(Irvine 2005: 7),依从对资本主义发展有利的各种制度和规范来选择自己的人生。亨利·达什伍德去世后由他的儿子继承了家产,资本主义“长子继承权”(primogeniture)保证资本的聚集,而女性则被排除在外,所以尽管两姐妹的祖祖辈辈都定居在诺兰庄园,但亨利死后,“全盘家业都被冻结了”,只能世袭给“偶尔来过几趟的儿子和四岁的孙子”,埃莉诺姐妹和母亲“反而落得寄人篱下”,不得不另寻去处(奥斯丁 2013: 7-10)。对这样的制度她们只能遵从,这是权力从外部物质层面起作用的结果,即个体在外部权力的作用下身体的屈从。在这个屈从的过程中,“规训(discipline)就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即‘驯顺的’肉体”(docile body)(Foucault 2007: 156)。但是“服从”却包含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被屈从”(subordinated)的过程,即“驯顺的肉体”的形成,二是主体的分裂和转向导致权力以一种精神形式成为新的主体,即驯顺的精神主体。而就权力如何从物

质领域进入精神领域,并造就驯服的精神主体,巴特勒借助弗洛伊德“自我”与“超我”(super-ego)的理论给出完美的阐释。

弗洛伊德认为,“自我与理想(超我)之间的冲突……最终反映出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心理、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之间的对立”(Freud 1960: 32),其理论中的“超我”人格实际上相当于福柯理论中的规训的权力(Tonner 2007: 1)。主体化过程(服从)主要通过身体发生,“权力不仅仅对身体起作用,而且也在身体内部起作用,权力不仅产生出一个主体的边界,也渗透到那个主体的内部……对身体来说,似乎有一个内在层面(inside)在权力入侵之前就存在了”。巴特勒认为,这个“内在层面”是个体的心理范畴,而心理层面形成了抵制权力管制的阵地(Butler 1997: 79-84-86)。然而,在古典时代这种权力的规训和控制已经演化得愈发精确有效,“人体不再是被当做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对待,而是‘零敲碎打’的分别处理,对其施加微妙的强制”,所以不仅身体的各部分受到权力的强制,就连最隐秘的心理层面也无法逃脱权力的管制(Foucault 2007: 155)。

权力对身体的强制产生主体的屈从,因为“社会范畴同时意味着屈从和存在,服从利用存在的欲望,在服从的范围内,主体存在的代价就是屈从”(Butler 1997: 18)。阿尔都塞和福柯都认为,在“服从”的过程中,有一种基本的屈从(同上:5)。这就是为什么埃莉诺姐妹必须遵从外部权力,以制度和规范的形式对其生活进行规范。这种“屈从”表现为主体对外部权威力量的一种接受,但是在“屈从”中暗示一种主体的能动性(agency),主体这种能动性总是且只反对权力(同上:15)。这种能动性存在于埃莉诺“自由无拘的自我”之中,当她在确认爱德华订婚的消息时,尽管带着“揪心的悲怆”,却“没有失去自制”(奥斯丁 2013: 101)。后来在向玛丽安袒露心声时,她表示对于爱德华与露西订婚这种敛财逐利的婚姻现象她只能屈从,尽管她“一直很痛苦”,但是由于她“要向亲友负责,不让他们担心”,所以她理性地克制着她的痛苦情绪,不让人们发现异样,而这些都“不是自然发生的”,都是她“一直拼命克制的结果”(同上:192,194)。埃莉诺的这种“克制”实际上是主体能动性斡旋外部权力的表现,对于外部权力的规训(资本主义婚姻制度),她并没有一味地反抗,也没有被彻底压垮,而是在屈从中保存主体斡旋权力的能动性,保证主体的存在,并且同时微妙地彰显女性主义的能动性。

而对于玛丽安而言,对规训权力的一味抗拒使这种能动性在忧郁症中,即变得“贫乏和空虚的自我”中丧失,进而被权力的精神形式所取代,成为驯顺的精神主体。威洛比为了追逐金钱利益和格雷小姐订婚而抛弃了玛丽安,作为和埃莉诺一样的资本主义婚姻制度的受害者,她

并没有调停(mediate) 自身与规训权力的冲突并选择屈从, 而是拒绝接受现实。她“一阵阵地失声痛哭, 感到悲痛欲绝”, “她白日不思茶饭, 夜晚睡不踏实……感到头痛胃虚, 整个神经脆弱不堪”, 并告诉埃莉诺“你永远也看不到我变成另外一幅样子。我的痛苦无论怎样也无法解除”(同上: 137, 138)。她对权力一味抗拒的结果便是权力对身体更加严厉的规训, 于是玛丽安一病不起, “病情越来越严重”(同上: 224), 最后进入“忧郁症”的状态, 肉体被规训权力彻底压垮, 精神层面也随之陷落, 她开始“滔滔不绝地自责”, 使“自我的一部分反对其他部分”, 造成主体的“分裂”和“转向”, 权力以一种自我“转向”后的精神形式替代主体, 使主体彻底丧失反抗权力的能动性(Freud 1986: 209)。

在这个过程中, 无论是埃莉诺的“哀悼”还是玛丽安的“忧郁症”, 实质上都是对权力规训所作出的反应, 同时也是权力在规训过程中对个体二元分化和标记的结果。弗洛伊德从心理分析理论出发, 将忧郁症定性为一种精神疾病。福柯则将忧郁症定义为疯癫的一种, 认为“疯癫只有相对于非理性才能被解释, 非理性是它的支柱, 或者说非理性规定疯癫可能的范围”(Foucault 1988: 75)。忧郁或忧郁症作为一种异常的状态, 早已被广泛关注, 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以及盖伦(Galen) 的“气质学说”都将忧郁症归结于“黑胆汁”(black bile) 过多导致人体体液的不平衡。18 世纪, 塞缪尔·约翰逊在他编写的《英语大辞典》(*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755) 中, 将忧郁定义为“一种由于黑胆汁过多而导致的疾病, 一种执着于某物导致的疯癫”(Bowring 2008: 14)。所以“理性/疯癫关系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向度”, 理性时代“造成理性与非理性相互疏离的断裂, 理性对非理性的征服, 即理性强行使非理性不再成为疯癫、犯罪或疾病”(Foucault 1988: 2)。而权力对个人的控制按照双重模式运行, 首先将对象二元划分并打上“疯癫/心智健全、有害/无害、正常/反常”等标记, 然后对反常的个体进行分配和规训(Foucault 2007: 223)。

弗洛伊德的“哀悼与忧郁症”实际上将埃莉诺和玛丽安划分进了不同的群体范畴, 玛丽安成为被打上标记的“反常的个体”, 使其进一步成为“权力规训的对象和目标”(同上: 154); 而奥斯丁对疾病在社会文化层面意义的关注, 使玛丽安的这场疾病在文学象征层面具有福柯式规训和惩罚的意味(Wiltshire 2005: 304)。在玛丽安病重命悬一线之际, 奥斯丁安排善于斡旋的埃莉诺同资本主义婚姻和父权的代表威洛比进行交流, 之后玛丽安象征性地复活并从忧郁症中康复。这场带有亚里士多德式净化色彩(Aristotelian Catharsis) 的忏悔和畅谈似乎象征昏迷中的玛丽安的本我、自我、超我间的对话和斡旋, 代表自我的埃莉诺作为重病昏迷中玛丽安的代理, 与代表资

本主义婚姻和父权的威洛比进行对话, 威洛比忏悔自己“并非一直都是个坏蛋”, 但为了“重振家业, 避免陷入相对的贫穷”, 他不得不在妻子的威逼下, “奴隶般地抄写了”绝情信给玛丽安, 并哀求埃莉诺“可怜可怜他当时的处境”(奥斯丁 2013: 234, 235, 240)。而最后埃莉诺“确实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她还说原谅他, 同情他, 祝他幸运”(同上: 243)。这无疑代表本我与超我的一次调停, 个体与权力的一种斡旋(读者应该注意到经历“哀悼”之情后的埃莉诺在此处的能动作用)。所以在这场会面后, 玛丽安奇迹般地康复, 并按照大家的意愿选择嫁给布兰登上校, 成为一名“担负起新的义务……的村庄的女保护人”(同上: 276), 至此她同埃莉诺一起成为奥斯丁笔下典型的启蒙女性主义的代表。

在这场个体与权力的博弈中, 埃莉诺在权衡自身欲望与外部权力时, 理性地斡旋与外部权力的关系, 虽然屈从于外部权力, 却仍旧保存反抗和调停权力的能动性。她在被权力击垮的重病中的玛丽安昏迷之际, 以调停者的身份与权力进行斡旋协商, 最终帮助妹妹达成心理与精神上的双重和解。而玛丽安最终成为权力从外部和心理层面双重管制下“服从”的个体, 这无疑代表福柯意义上的被规训的个体。

5 结束语

蒲苇(Mary Poovey) 认为, 与奥斯丁的其他作品相比, 《理智与情感》是一部更为“阴暗”的小说, 主要表现个人意愿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Poovey 2009: 32)。而这场冲突正是个体与权力的博弈, 很明显个体的意愿屈从了社会规范代表的规训权力, 其最终结果是权力完成了对个体的规训与管制。这种个体在物质层面对权力的屈从保证主体的存在; 而个体的激烈反抗必然招致权力更加严厉的规训与管制。奥斯丁对疾病在社会文化层面意义上的关注(Wiltshire 2005: 304), 使玛丽安的疾病成为违反规范的“惩罚”(Mullan 2005: 384)。在这场个体与权力的博弈中, 埃莉诺在“哀悼”中保持理性的斡旋, 使性别的主体在屈从的条件下得以存在, 在驯顺的肉体中保存了“自由无拘的自我”和主体的能动性。而玛丽安则在反抗资本主义和父权的过程中, 招致了权力更加严厉的规训与管制, 使自我变得“贫乏而空虚”, 丧失了应有的能动性, 导致权力的精神形式对自我的取代, 最终走向主体的服从。

参考文献

- 黄 梅. 新中国六十年奥斯丁小说研究之考察与分析[J]. 浙江大学学报, 2012(1) .
- 简·奥斯丁. 理智与情感[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
- 杨卫东. 规训与惩罚——《土生子》中监狱式社会的权力

- 运行机制[J]. 外国文学, 2002(4).
- Bowring, J. *A Field Guide to Melancholy* [M]. Harpenden: Old Castle Books, 2008.
- Butler, J. *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Theories in Subjection* [M]. Chicag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Derrida, J. To Do Justice to Freud: The History of Madness in an Age of Psychoanalysis [A]. In: Davidson, A. (Ed.), *Foucault and His Interlocutors* [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 Foucault, M. Power/Knowledge [A]. In: Gordon, C. (Ed.),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 – 1977* [C].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 Foucault, M.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8.
- Foucault, M.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7.
- Freud, S. *The Ego and the Id* [M]. London/New York: Norton, 1960.
- Freud, S.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A]. In: Smith, A. (Ed.),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XIV (1914 – 1916): 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Papers on Metapsychology and Other Works* [C]. London: Hogarth, 1986.
- Grace, W. Foucault and the Freudians [A]. In: Falzon et al., C. (Ed.), *A Companion to Foucault* [C].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2013.
- Hook, D. *Foucault,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tics of Power*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Irvine, R. P. *Jane Austen: A Source Book* [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5.
- Mullan, J. Psychology [A]. In: Todd, J. (Ed.), *Jane Austen in Context* [C].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Poovey, M. Ideological Contradictions and the Consolations of Form: The Case of Jane Austen [A]. In: Bloom, H. (Ed.), *Bloom's Modern Critical Views: Jane Austen, New Edition* [C]. New York: Chelsea House, 2009.
- Sloan, T. Preface [A]. In: Hook, D. (Ed.), *Foucault,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tics of Power* [C].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Southam, B. C. *Jane Austen: The Critical Heritage, Volume 2, 1870 – 1940* [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87.
- Tonner, P. Freud, Bentham: Panopticism and the Super-Ego [J]. *Cultural Logic: An Electronic Journal of Marxist Theory & Practice*, 2007(10).
- Wiltshire, J. *Recreating Jane Austen*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Wiltshire, J. Medicine, Illness and Disease [A]. In: Todd, J. (Ed.), *Jane Austen in Context* [C].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定稿日期: 2016 – 03 – 10

【责任编辑 王松鹤】